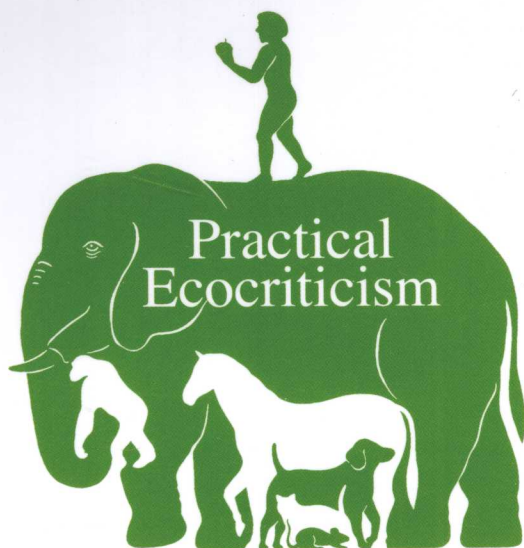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实用生态批评

文学、生物学及环境

[美]格伦·A.洛夫 (Glen A. Love) 著 胡志红 王敬民 徐常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实用生态批评

文学、生物学及环境

[美]格伦·A.洛夫 (Glen A. Love) 著 胡志红 王敬民 徐常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10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用生态批评: 文学、生物学及环境 / (美) 洛夫 (Love, G. A.) 著; 胡志红, 王敬民, 徐常勇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5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16639-0

I. 实… II. ①洛… ②胡… ③王… ④徐… III. 文艺批评—研究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631 号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SBN: 0-8139-2245-3

Copyright © 2003 by the Rector and Visi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实用生态批评: 文学、生物学及环境

著作责任者: [美] 格伦·A. 洛夫 著 胡志红 王敬民 徐常勇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639-0 / G · 28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25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译者序

生态批评是个内容宽泛的伞状批评术语，是关于环境取向的文学、文化甚至艺术研究以及指导这些批评活动的相关理论。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文学、文化批评潮流，它是在日益严峻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催逼之下，伴随着生态哲学的逐渐成熟而兴起的。迄今为止，它是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文化诊断尝试，其内涵丰富且不断拓展延伸。如果要追本溯源，确定生态批评兴起的大致时间，生态批评界多数学者赞同该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W. 米克(Joseph W. Meeker)于1974年出版的《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一著算起，其成熟于90年代中期，成熟的重要标志有：1995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同年，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出版了生态批评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及美国文化的形成》(*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6年彻丽尔·伯吉斯·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Burgess Glotfelty)和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共同主编出版了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式的批评文集和书目提要《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其后迅速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学、文化绿色批评潮流。总的来看，其内容庞杂丰富，学理探究深沉，学术视野宽广，且还在不断拓展延伸。但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诊断也并非完全击中要害，所开出的文化处方也未必十全十美，“药到病除”，

反而遭到了草根环境公正运动人士的质疑与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生态批评思想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其激进的一支深层生态学，受到了以有色族人民、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第三世界以及环境哲学内部的严厉批判，生态批评似乎也因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面临严峻的学术危机，生态批评圈中产生了普遍的学术焦虑。为成功地应对危机，生态批评学者不得不严肃慎重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立场，评估来自多方的批评，总结生态批评学术的得失，进行重大的学术调整。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部分生态批评学者顺应环境公正的诉求，将环境公正引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之中，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环境公正生态批评，1997年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学者 T. V. 里德 (T. V. Reed) 首次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术语^[1]。具体来说，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张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上，透过种族的视野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呼吁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家，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这样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而且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生态批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环境公正阶段。^[2]有鉴于此，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已经历了两次“生态风波”，第一波可大体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可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3]。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不是对第一阶段批评理论的简单抛弃，而是推陈出新。也就是，与第一阶段开展对话，对它予以修正、深化与拓展，其主要目的是透过环境公正的视野考察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的

[1] 参见 Joni Adamson, 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p.160.

[2] 参见 Joni Adamson, 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 eds. Introduc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 Introduc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pp.4-5.

[3] 参见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138.

关系。生态批评也从基于乌托邦理想的生态中心主义走向关注现实的环境公正。^[4]这一转向不仅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而且大大地深化、丰富了其内容。

这样看来,西方生态批评不仅要深层追问生态危机产生及其日益恶化的历史文化根源,抨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个毒瘤,还必须深挖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的现实根源,那就是锁定现实人类世界广泛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环境剥削与压迫,诸如: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殖民主义,等等。要从根本上缓解,甚至根除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学者必须超越天真地抨击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唯发展主义等思维模式,还必须探寻通向生态可持续和社会普遍公正的路径,倡导普遍的环境公正。

与第一阶段相比,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呈现了以下一些新的特点:(1)因为种族是环境不公的核心问题,环境公正是环境公正运动的宗旨,因此,种族视野显然成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察点;(2)环境公正批评要求大力拓展主流环境主义关于“环境”的定义,“环境”是“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也是我们祷告的地方”^[5]。因此,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工环境,甚至城市生态也纳入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生态批评也由此“回归”了人类社会;(3)批评手段的多样化,也就是,生态批评学者积极地借用其他批评理论或与它们交叉整合,深化、拓展其学术领域;(4)倡导大力修正第一阶段环境经典的尺度,拓展环境文类的范围,甚至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环境特性”,即便是传统生态经典,也可以透过生态公正的视野重新阐释;(5)强化文学与环境关系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

[4] Joni Adamson, 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p. 160.

[5] Joni Adamson, 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p.20.

这是对第一阶段区域主义文本中心的超越;(6)第二阶段特别强调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重视学术研究与生态政治、生态教育以及社会公正等之间的纠葛,以便更好地协调城市与乡村、环境公正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6]其中,美国生态批评学者亚当森(Joni Adamson)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公正和生态批评》^[7]及其与他人共同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8],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作品,后者确立了环境公正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批评范式,它倡导环境诗学与环境政治及环境教育的结合,在环境危机这样一个复杂、严峻、庞大的问题面前,既需要学理上的探究,更需要现实的考量,否则,我们的一切理论都只是乌托邦式的空谈,甚至是充满殖民色彩的生态东方主义。

在国内,文学艺术领域(包括生态文学创作领域)生态意识的觉醒虽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有所发展^[9],但是作为生态批评的文学理论应该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10]与余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11]。其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经过短短1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抨击人类中

[6] See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7] Joni Adamso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criticism: The Middle Place*.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

[8] Joni Adamson, 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9] 参见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载2008年《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

[10] 参见李欣复《论生态美学》,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11] 参见余正荣《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8期。

心主义，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生态批评同哲学一道走向荒野，并依然留在“荒野”之中。

总体上看，中国生态批评依然处于草创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作品还不多见，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无论在理论建构、学术实践，还是在学术势头、学术规模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即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所运用的理论比较单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阐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对女性压迫与环境退化（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性别压迫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纠葛还远未深入展开；理论明显滞后，等等。以上理论困境严重制约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深化，使其徘徊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困境中，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中国生态批评将会被淹没在生态文明的“洪流”之中，而失去其应有的学术批判锋芒与文化建构力量，进而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引发严峻的生态焦虑之后的生态学术生存危机。

有鉴于此，中国生态批评学者若要建构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并与西方生态批评开展富有成效的深度生态批评对话与交流，那么，首先了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代表性的生态批评家及其作品就显得非常必要、非常紧迫。其中，对西方生态批评代表作的译介就是了解西方生态批评的内涵及其发展状况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本书作者洛夫是美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其著述颇丰，该著于2003年出版，算得上第二波生态批评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因为其具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一些主要特征，下面将对它作一简要的介绍：

首先，洛夫将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性提高到突出的地位，并认为“跨学科”才是生态批评最显著的特征，用他的话说，“跨学科生态批评才能名副其实地代表科学生态学的理论与观点。”（原著第9页）因此，“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扎实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文学生态批评未

来必须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当然，跨学科研究“不是要求批评家不加区别地将最近的科学发现应用于文学阐释，而是要求他们应该培养科学的敏锐性……”总之，在洛夫看来，“生态批评强烈要求其实践者涉足跨学科及科学领域。文学研究的是相互关系，而生态意识提升与拓展我们的相互关联意识以涵盖人类与非人类环境。文学生态学思维要求我们认真对待非人类世界，正如以前的批评方式对待社会与文化所构成的人类领域一样。这似乎是生态批评的最大挑战，也是其最好的机遇”。要进行富有成效的跨学科研究，作为生态批评学者，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有关自然世界运行的科学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生态批评立足生态学——也就是，生态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那么就得接受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等问题。我相信，作为文学与环境研究领域的学者，与科学为伍，尤其是与生命科学为伍，我们将会受益颇多，恐惧日少。”（原著第39页）

当然，为了避免生态批评研究因科学知识的欠缺而导致无知与褊狭以及学术上的片面与偏激，洛夫也给我们建议了一些了解科学的好方法。（原著第47—49页）在此，作为生态批评学者的洛夫实际上已经与人文学科领域中怀疑甚至反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展开了对话，甚至还与生态哲学领域的某些派别展开对话，因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真理是建构的”，真理诉求只不过是给别人施加统治或使这种统治合法化的手段，因此没有所谓的“客观的”科学真理或知识；不少生态哲学家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归因于近现代以来笛卡儿—牛顿的机械论科学，因为它是干涉性的、还原论的、机械论的及工具性的，因此我们应该彻底否定现代科学。由于深受后现代思潮及生态哲学观念的影响，第一波生态批评蕴涵激烈的反科学甚至否定科学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理性、冷静、公正地评估这些批判，就会发现其中不少是受非理性的情绪的影响而触发的。因此，洛夫倡导我们学习科学、了解科学，甚至还为还原论科学方法正名。

其次，洛夫主张恢复还原论科学方法的合法地位。在洛夫看来，“整

体主义思维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应该考虑复杂系统的种种情况，为此，我们就需要还原论技术，因此，整体主义思维或从上到下的思维的发展与完善有赖于还原论及科学方法验证技术的零敲碎打的修补”。还原论实际上是一种进入复杂系统、了解该系统的研究策略。归根结底，“弃绝还原论的复杂之爱构成艺术，而与还原论相伴的复杂之爱就产生了科学。”（原著第43页）在我们看来，洛夫的这些观点都是符合人类实际生存状况的，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富有见地的观点。

总之，缺少了科学方法，科学只不过如其诋毁者所指的那样永远受制于文化的活动。然而科学已经取得了其“崇高”的地位，因其遵从方法论上的严谨，故在发现自然运作机理方面成绩斐然。

有少数科学家也许会夸大或歪曲其数据，但一门学科的方法论有理由质疑、反驳甚至纠正那些不实之词。很遗憾，在非科学领域，夸大证据或混淆是非常常却逍遥自在。当科学被社会误用时，社会机构却能给予纠正。如果科学用于有害的、破坏性的方面，那么将会被作为糟糕的策略予以清理，受到挑战，而不会被当作“科学”的原罪，方法论上的优点应该从文化语境中得到拯救。我们需要证据及理性思想之标尺，以让我们超越各种蛊惑人心之空洞理论。

由于，科学具有方法论上的优点，具有严格的纠错验证功能，因此获得具有普适性的“客观科学知识”是可能的。因此，洛夫认为，“生态批评应该遵循严格的方法论之精神而运作。”（原著第45页）由此可以看出，洛夫的观点是理性的、诚实的，也是可行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诸如环境问题及许多其他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可靠路径。

再次，洛夫不仅挑战前期生态批评的反科学倾向，而且主张将生态批评奠定在牢固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倡导建构生物学取向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生物学取向的生态批评范式，因为“作为自然科学中距离人们最近的一门学科，生物学是自然的连接点，也是一门……可以宣称与人类生命具有持久、重要关系的学科。”（原著第54页）在他看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现代生命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人类危机和转机最为正确的基础，这种意识不仅影响了我们广大教师和学者的工作，而且也影响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我们与生活在这日益狭小的星球上的生命联结在一起。在现代西方知识界的三巨人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中，只有达尔文几乎还没有被文学学者们发掘运用，尽管他的发现在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达尔文和作为其遗产的现代生物学被忽视的教育体制之中，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总是持续不断地受到蒙蔽。（原著第 165 页）

该著最为精彩之处不仅在于洛夫建构生物学取向的批评理论，还在于亲自运用其理论重审文学文类、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对其内涵或颠覆、或重构、或拓展，这不仅拓展了生态批评的学术空间，而且还大大丰富深化了其内涵。

最后，我们来看看洛夫是如何进行文学经典重审的。经典重审是本著的重头戏，所以洛夫慷慨泼墨，其中不乏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首先，洛夫透过生物学的视野对古老坚韧的田园文学文类的颠覆与重构。在他看来，“重审田园文学传统可以揭示，在环境焦虑日盛的时代田园文学理论与实践能否继续保持其重要价值。”（原著第 64 页）

站在生物学立场上，透过跨学科视野，洛夫认为，“田园风情持续不断的吸引力是与威尔逊的生物之爱极为相关的，就是敬畏生命，就是对我们自身作为源于自然的生物的本能感受。”（原著第 70 页）但是这种似乎充满永恒魅力的古老文学文类却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是对复杂丰富的自然世界的简单化、理想化处理。根据生物学对自然的了解，“社会复杂，自然简单”的观点确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最大错误观念之一，可谓“宇宙的讽刺。”（原著第 23 页）因为现代生态学早已告诉我们，最了不起的智力之谜是地球及它滋养的无数的生命系统，自然显示出的适应策略远比人类设计的任何策略要复杂得多，故洛夫倡导依据现代生态学知识对田园文学传统进行生态学重构，让

这种古老的文类在生态危机时代重放生态光彩。

在本著第4章中,洛夫跨越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界限,透过生物学视野,尤其是透过进化生物学视野,主要分析了著名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名篇之一《教授的住宅》中的地方、风格和人性的关系,探讨了小说中原型因素和普遍人性的生物学基础,说明了小说中文化/审美因素及生物因素在修辞学上的交融。通过分析洛夫得出结论:“凯瑟杰出的贡献在于在作品中展现了不是微不足道的差异从文化上把人类隔离,而是主要的共性把我们联合为一个物种,为值得铭记的人类交流和理解提供基础。没有人类经验共性——汤姆第一眼看到崖城时的震撼感,就不会有交流,不会有艺术,不会有学习和传授,也不会有任何超越这些不同的彼此封闭的文化藩篱所限定之外的需要和愿望。”(原著第115页)就其风格而言,凯瑟关于风格的理论预示且极像海明威著名的省略理论,或“冰山原则”,甚至可以这样说,海明威将薇拉·凯瑟在《教授的住宅》的最简化文学试验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原著第115—116页)

在本著第5章“动物中的海明威”中,洛夫透过生态学的视野重释了海明威人生经历及其经典之作。洛夫就此与其他海明威批评家展开对话,对海明威的原始主义进行重新界定。譬如,有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的原始主义是对当代社会的否定,回避现代生活面临的问题”,而洛夫认为对海明威的原始主义还需进一步探讨。在他看来,“海明威不是排斥智力和社会而偏好原始主义价值和生死及土地的节奏”,而其原始主义中海明威经常采取一种侵略性和孤僻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与他敬畏的自然存在相冲突,这样他经常转而针对地球本身。海明威热爱自然世界的感觉和愉悦,但仍然痛恨拒绝给他永生的亘古不变的自然轮回。海明威似乎有一种在自然消灭他之前报复自然的冲动,他这样描述自己“为了反抗死亡”。甚至可以说,海明威企图通过杀戮自然,而证明作为人的伟大与超越,这在其作品和人生的经历中都大量存在。(原著第121页)海明威原始主义的悖谬根源于“与地球开战

及为强化自我剥削自然世界的对立倾向。他独特的原始主义一般排斥这些认识——一切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世界和谐统一的意识，理解并使用复杂的自然过程而不摧毁它们的能力，接受死亡作为不可避免和不具有威胁的存在之流的一部分。”（原著第122页）因此，海明威作品的“伟大力量大都来自于狂妄的个人主义和永存大地之间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张力。但是这种伟大的部分代价就是一个贬值的地球，一种原始主义观念，就像今天他的读者一样，海明威在他职业生涯尽头还在计算其代价。”（原著第133页）也就是，海明威的原始主义并没有产生对自然发自肺腑的热爱、对自然过程及其存在物原始价值的敬畏，而是通过摧毁自然过程及其存在物证明自己的超越与伟大，他的原始主义是破坏性和毁灭性的，说小一点，造成个人悲剧，说大一点，造成生态破坏，切断了当代社会的有机来源。因此，海明威的原始主义本质上是反生态的。

在第6章中，洛夫进一步拓展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范围，他主张文学批评不仅要涵盖社会和历史的议题，还应该涵盖生物和生态的议题。为此，洛夫从生物学及达尔文进化理论出发探讨困扰人类的古老问题——人性。挑战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及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白板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预设将人之心灵看成是“社会产品”、只等待文化去刻印的白板或“外在编程输入的通用计算机”。（原著第55页）也就是说，文化本身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任何生物学或进化论的解释都毫无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这种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并被取而代之。生物学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挑战源于达尔文关于人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的认识——他们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身体和大脑都在进化，因而“人的行为不只是一个全靠文化来提供内容的空容器，而要深受遗传因素的影响，遗传因素是文化因素的基础并影响文化，反过来也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不再是可置之不理的少数人的观点。”（原著第6页）洛夫在较为周详地梳理了界定人性生物学基础理论之后，运用这样的理论重释了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之父”

威廉·迪思·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几部经典小说,尤其是其乌托邦系列小说《奥尔特鲁里亚传奇》(*Altrurian Romances*)。在分析了这几部乌托邦小说以后,洛夫得出结论,由于豪威尔斯乌托邦小说中的“利他主义原则并非建立在进化论思想或他对人类性格观察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性虚幻的重写这一基础之上,在这其中,宇宙的乐观主义战胜了现实主义者对一切可能性的敏锐意识。豪威尔斯进化主义观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奥尔特鲁里亚传奇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牵强附会的世界改良论,而在于在其最好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人们所看到的那种对生存喜剧的勇敢担当,对勉强幸存后的可疑补偿所给予的大胆承诺。”(原著第162页)也就是说,豪威尔斯的利他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悖的,因此注定会招致失败。

总之,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一著是第二波生态批评的代表著作之一,其旨在与第一波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既要修正其偏颇,又要拓展其范围,还要建构新的理论;既要建构崇高的乌托邦理想,还要立足牢固的生态现实,让生态批评真正成为维护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多元、公正、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学文化思潮。

本译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生态批评史》的阶段性成果,是由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志红博士、河北工程大学的王敬民博士、徐常勇副教授三位学界同仁分工协作完成的。胡志红负责翻译“引言、第一章及第二章”,并负责审定全书;王敬民主要负责翻译“第三章和第六章”;徐常勇主要负责翻译“第四章、第五章及后记”。硕士生陈婷波与本科生赵金兰协助整理“索引”,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本著跨越多个学科,这给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译者学术阅历有限,知识结构欠佳,所以译著中理解偏差,甚至理解错误在所难免,望学界各位前辈、同仁批评指正。

2009年3月于四川师范大学桂苑

目 录

译者序.....	3
导 论.....	1
1 为什么需要生态批评?	13
2 生态批评与科学	41
3 我也在阿卡迪亚: 田园风遭遇生态批评	73
4 薇拉·凯瑟的《教授的住宅》中的地方、风格和人性	103
5 动物中的海明威	133
6 奥尔特鲁利亚的现实主义者: 豪威尔斯的进化论、 乌托邦主义和生态学	153
后 记.....	185
注 释.....	191
参考文献.....	207
索 引.....	229

导 论

在第三个新千年，也即常被欢呼为“环境世纪”的新世纪伊始，^{<1>}一个声势浩大、目标统一的运动蓬勃兴起，它致力于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通常被称为生态批评。环境与人口的双重压力必然更加支持这样的立场：任何涉及社会现实与物理现实的文学批评将会涵盖生态的考量。

《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的编辑们在其1999年的生态批评专刊引言中写到，生态批评“倡导基于自然事实的阐释及基于生物圈，甚至整个星球条件的阐释，因为没有这些，人类生命将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人文知识了。生态批评的阐释维度近乎事实视野本身，即作家或读者占据的涵盖文化意蕴因子和自然因子的有限环境，其中，后者先于前者存，后于前者亡。”(塔克/Tucker, 505页)另一种说法是，不像其他形式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除了涵盖人类语境及其相关考量，还包括非人类环境。有鉴于此，生态批评既要挑战过去的诸多批评体系，还要挑战许多后现代批评话语。

自古以来，文学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存在于田园文学传统中。对像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小说、诗歌及散文等经典作品的学术关注在文学研究领域早已占据了其应有的位置，然而，根据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界定，具有“致力于环境实践之精神”的真正当代意义上的自觉的环境主义批评，似乎肇始于公众对核毁灭、失控的人口增长、荒野自然区域的丧失、加速的物种灭绝以及日益恶化的空气、水以及土地污染等表示普遍关切的20世纪60年代。(*《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430页)^{<2>}

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出版于 1962 年, 如今被普遍看成是当代环境运动的杰作, 该作熔铸了小说家的艺术与科学家的知识于一体, 生动描绘了滥用杀虫剂所造成的危险。^[1]

像许多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其他年轻学者一样, 我也是受到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影响而走向文学之路的。那个时候, 我的妻子罗达 (Rhoda) 是一位生物教师和植物生态学家, 我们都对日益退化的环境表示关切。我们积极参与资源保护运动, 共同编辑出版了第一个“后寂静的春天”重要生态问题文集。^[2] 20 世纪 60 年代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 深受利奥·马克斯 (Leo Marx) 论述美国生活中技术与自然冲突的新书《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的影响。马克斯对美国文学、文化的精湛解读, 是我钟爱的神话——象征批评绝好的例证, 对像我这样的正从事美国文学中环境思想研究的年轻学人来说是很好的激励, 但是在我看来, 该书的最后几页似乎替自然在美国思想和文化中的位置特意提前书写的碑文。

在马克斯的书快要结束的秋天, 古老的田园思想被描绘成了无情的“历史现实”的受害者, “其内涵如果不是全部, 至少大部分已被剥去” (363 页), 如此生动地描写美国机器文明日益增强的统治, 马克斯肯定是对的, 然而, 其结论中未涉及的是自然的生态复杂性, 人完全控制自然的不可能性以及美国人顽强抵抗陷入历史和文学的讽刺——被马克斯明智地称为“我们文化的根源性冲突”——的决心。(365 页) 正如马克斯宣称的那样, 如果说 19 世纪美国神话中古老单纯的田园世界已经被一扫而光, 那么, 一个新的、明确的、多种非神秘力量的复合体仍然在起作用, 它与民权运动及反越战抗议运动交织在一起直接将这种根源性冲突呈现在我们面前。滑稽的是, 《花园里的机器》于 1964 年出版, 正值卡森畅销小说《寂静的春天》掀起轩然大波的时刻, 该小说无情地记录了广泛的环境威胁, 其严重程度足以让新兴的美国坐卧不安, 也诠释了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的诗歌“都市的小河”。